

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科学理论体系研究

郝庆治

党的二十大之后，学理性阐释、学术化表达和体系化建构，日益成为国内学界对于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共识。^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更高的学术理论自觉和专业化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出更科学的体系化阐释与构建。^②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研究的“科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创新理论及其研究，比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是两个密切关联但并不等同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更多是由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以官方文献表述和职务著述等权威形式来呈现的政治与政策阐述话语。因而，其科学性主要体现为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的客观反映与实践指引，也就是人类认识因为与社会实践相契合对应——正确反映并有效指导——所呈现出的真理性；就后者来说，它更多是指学术理论界对体现这种思想的各种文献著述或文本内容所做的进一步诠释、重述和构建，旨在揭示或彰显这些著述或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深刻联系、逻辑线索和因果规律。因而，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基于特定学术规范或学科视角的学理性阐述在内容上的系统性和结构上的完整性。

基于上述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当然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概言之，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生态理论（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将会在持续推进这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创新发展。也就是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经历了一个从孕育萌生、形成确立到丰富发展的理论生成过程，也会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逐渐拓展深入而不断自我完善与

【作者简介】郝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①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问题研究——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雷声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第20—29页。

② 郝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第16—25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一种分析框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67—76页。

革新，也就是科学性日益显现和增强的动态变化过程。但更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则是学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其过程、方法的科学性。事实上，国内学界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倾力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术理论研究，并且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比如，张云飞依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出的“范畴—群—系列—体系”的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辩证思维模式，系统探讨了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构成元素的核心（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思想系列^①，而张瑞才和李达则明确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科学概念体系、完整理论框架、鲜明理论特征和创新话语体系所组成的系统理论体系^②。

但总体说来，这些讨论还存在着至少如下两个明显不足，并影响到了这一议题研究的科学性或整体水平。第一，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系统性或结构完整性的一般性强调较多，但对于其系统完整呈现本身的刻画或论证不够清晰充分，未能清楚表明它的丰富内容与多样化表述何以是一个意涵明确、结构完整、逻辑自洽的理论话语体系；第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的概括，过分拘泥于对习近平同志本人表述的直接引用与党和政府文献的转述，使得本应作为理论话语体系标识的学科视角和学理性言说特征不够突出。因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科学性”或科学体系研究，仍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亟待加强的基础理论性议题领域。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研究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研究所关涉的另一个基础性概念，是与“科学性”密切关联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理论体系”。

一般来说，一个思想或理论（体系）之所以称得上是科学的——有着内容与结构上的系统完整性，应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表征：理论、实践与传统三个层面的统一整体；理念原则、制度构想与战略举措三个维度的统一整体；学术思想、话语理论和学科教育传播三个体系的统一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上述这三个层面所实现的进展或积淀来判定一个思想或理论的成熟程度。具体地说，前者指的是某一个思想或理论不仅有着明确可靠的实践基础或回应，而且深深扎根于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彼此涵养的理论生长环境；中者指的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或理论都不会停留于一些抽象孤立的话语语词或价值观念，而是会逻辑推演或自然衍生出相应的理想制度构想和社会政治行

① 张云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体系初探》，《探索》2019年第4期，第22—31页。

② 张瑞才、李达：《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第3—11页。

动战略，从而构成一个从为什么、是什么到如何做的理论整体；后者指的是较严格意义上的重要思想或理论还会进一步分化出它的学术思想体系、话语理论体系和学科教育传播体系。

具体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研究，一方面，它的确具有上述三重意义上的系统完整性或科学性。换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显呈现为一个如下三个层面上的统一整体：理论、实践与传统的统一整体；理念原则、制度构想与战略举措的统一整体；学术思想、话语理论与学科教育传播的统一整体。比如，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的、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即“5·18”《讲话》）^①，就显然是一个由“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三个维度构成的完整系统整体或理论体系样态。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任何一种体系化思考或概括的科学性问题。比如，对于“三大体系”即学术思想体系、话语理论体系和学科教育传播体系的表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这些次级体系基本意涵的共识性理解。在笔者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思想体系主要是指学界围绕哪些主要议题、运用哪些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哪些创新（系统）性学术观点；话语理论体系主要是指学者创制或引入了哪些核心概念语词或基本命题假设从而构建起来哪些理论体系样态或理论叙事；学科教育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学术思想或话语理论上的成果凝练成了什么意义上的学科地位以及宣教形式（比如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方式）。而无论是学术思想研究、话语理论体系还是学科教育传播，都有着各自明确的科学性要求。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可以期望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诞生。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研究的“自主科学理论体系”

毋庸讳言，当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仍是大幅度提高其整体性的科学水平。而对于这一难题的最有效破解之道，就是主动引入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将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理论构建的一般性科学方法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体系化阐释构建的“科学体系”的基本要求相对照，从而概括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需要讨论的基础性问题，比如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体系化学理性概括和阐释的整体科学性（衡量尺度）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构成性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的科学确定及其意涵阐释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性理论体系样态的科学构建以及比较分析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方向（理论宣教体系）的科学凝练与建设问题，等等。由此，我们就不仅可以做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多样化理论体系概括的更丰富认知，还可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22页。

以对其中某一个维度有更为科学的理解。

除了科学性之外，同样值得关注与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的“自主性”特征及其形塑。应该说，以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为依托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自主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自主性环境社会政治理论。当代中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教研传播群体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外交流背景语境下构建起来的，意味着它们本身也是深受欧美国家知识框架和传统影响的学术知识（人才）体系。因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所强调指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一代中国学者必须致力于在面向时代（世界）之问、回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能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与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理论体系最有理由率先跨越各种门槛以实现这种目标追求。

责任编辑：黄承梁

在“两个结合”中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 生态文明“三大体系”建设

方世南

在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和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性危机的态势下，生态文明不仅成了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而且已融合和渗透到众多学科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简称“三大体系”建设）是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是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三大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和根本保障。

一、充分认识在“两个结合”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出了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作者简介】方世南，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邮政编码：215123。